

厘清史实 促进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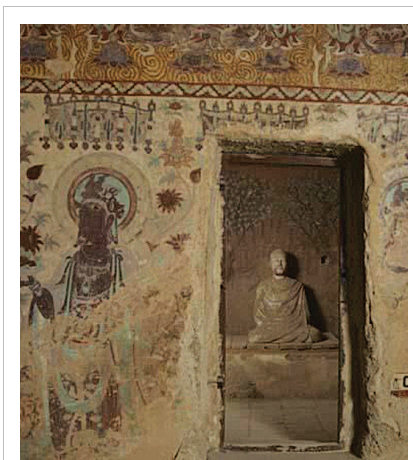
■柴剑虹

高田时雄教授的这本最新著作《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中,约有半数文章所论,集中关涉日本学者赴中国与欧洲探求敦煌写本及敦煌写本流入日本等史实。

众所周知,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古写本文书为主之古物发现及其流散,导致“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兴起,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学滥觞,日本学者踊跃“预流”,着其先鞭,贡献杰出,亦是不争之事实。然而,相较于英、法等国,敦煌写本如何流入日本以及众多学者访求抄录、收藏、流散、辨伪的情形,却最为扑朔迷离。

记得20余年前,导师启功先生将他从东京旧书肆购得的中村不折所著《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送给我,曰:此书所涉我国文物甚多,均极为重要,唯其中敦煌卷子的流布,尚多需考索之处,应译成中文本让更多我国学者研读。遵师命,我请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的李德范女士翻译全书,启功先生欣然为之题签,由中华书局汉学室编为“世界汉学论丛”之一出版。然而,敦煌学百年,前述令学界迷茫的一些问题,迄未得到准确清晰的答案。

高田教授作为新世纪国际敦



出土敦煌卷子的莫高窟藏经洞。



《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 [日]高田时雄著 中华书局出版

煌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日本公、私所藏敦煌写本于近年陆续集中刊布之背景下,广搜资料,苦心孤诣,自觉承担起相关史实追本溯源、求索考辨之重任,撰成详细辨析此中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系列文章,以求厘清面目。从此书编集的这些文章看,不仅李盛铎旧藏之敦煌写本流入日本的背景及途径已基本明朗,许多日藏敦煌写本来源、辗转及真伪问题的疑团得以化解,而且日本学者赴北京、欧洲访卷的细节亦更加清晰明了;尤其是《俄国中亚考察团所获藏品与日本学者》一文,首次述

及日本学者矢吹庆辉最早在1916年底就浏览了俄国奥登堡探险队带到彼得格勒的敦煌写本,并且于次年发表了相关报告,也第一次提及二战前石滨纯太郎即关注了俄藏敦煌文献等。这些真实资料的发掘,既有助于进一步廓清藏经洞劫余写本流散之概貌与一些细节,也必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包括中国、日本及欧洲在内的国际敦煌学史的研究,真是功莫大焉!

书中其他十几篇文章,则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近代大量中国古籍流入日本、欧洲,明治维新后

中、日古书的回流态势,以及日本机构及学者个人对所藏汉籍的编目等方面,对于中、日两国关注此事的学者来说,这既是中日两国近代学术史中饶有兴趣亦不乏辛酸和十分重要的议题,也与欧洲汉学研究之兴起与步入新阶段至关重要。其中对许多史料的引述及情状的阐释分析,可以说相当翔实,即便是一些推测、联想,也颇合逻辑思辨,且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而显得特别宝贵。诚如我近几年来多次强调的,特定环境下文物的保护、流散、研究的核心是人,文化交流、传承的关键也是人,而在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书”(以写本、印本为主的各类图籍)。据我粗略统计,高田教授此书涉及与近代中国、日本、英、法、俄罗斯等国学术关联的人物(包括藏书家及其遗族、商贾或中介人),不下百位,而所涉图书数以万计,对这些人相关活动踪迹的考索,对这些书籍流散、收藏的追寻,涉及众多国家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关涉多种文字的论文、专著、日记及公私档案材料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多年来,作者目标坚定,视野开阔,充分发挥其作为语言通才的优势,在庞杂的资料中孜孜不倦地认真爬梳,拨开迷雾,理清脉络,终于取得了令

人信服的可喜成果。

日本知识界向来有重视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传导的良好氛围,而经过明治维新的启迪,许多站立于革新潮头的学界优秀人物,不仅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努力借鉴西方文明,而且通过其获得政府支持的各种途径,加紧获取乃至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以推进其学术研究。这与清末民初因列强欺凌、朝政腐败而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保守、颓唐、无奈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进行,文物图籍的外流,同时也激发了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促进了中国人学习域外先进、增强引入与借鉴西方与东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紧迫感。这也正是文物流失的正、负面作用。我又想起民国初期王国维、罗振玉在日本京都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共研敦煌写本,以及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哲前贤,远赴欧洲访求敦煌写本的故事,便是最生动的例证。姜亮夫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的“自序”中指出:“民族与民族的了解,人类的真正情感交流,乃至真正的和平共处,是在互相了解,了解的一个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法则,是交通……有了这些交流,才能互以幸福相交换。”我以为高田教授此书的一个重要价值,也在于通过对这些学术史上文化交流真实细节的考索与阐释,来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实现“互以幸福相交换”。

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阳光

■张怡微

《不吃鸡蛋的人》是钱佳楠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2015年,她26岁。这不禁令人想到纳博科夫在27岁时,在其处女作《玛丽》的序言里写“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不吃鸡蛋的人》饱含这样强烈的倾向,又令人相信、甚至是憧憬钱佳楠在未来的写作中得以轻装上阵。

《不吃鸡蛋的人》表面上写了两件女性生命中重要的记忆。一是初恋,二是嫁人。在这个充满伤痛记忆的成长故事里,这两件事被残忍地撕裂了。小说女主角周允爱上了一个她的“出身”所制约她放肆去爱的普通人,嫁了一个能够令她在家族生活的舆论中获得片刻安宁的“条件好”的男人。为此周允付出了糟糕的代价,她为自己的身体撒了谎,修补处女之身以期换得一个别人眼中的好婚姻。所以这又近似于一个旧女性的心灵故事,母题可能是来源于古希腊著名悲剧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一个父亲献祭女儿给神的故事。但重要的是,这个当代女孩自己怎么想?她心里的神又到底指向的是什么?

“不吃鸡蛋的人”题目本身就显出青春的执拗。为了能省下私校住校的钱,周允选择撒谎。她明明很喜欢吃鸡蛋,却说

不吃鸡蛋,并为此长期不能在众人面前点鸡蛋,还因此获得同情。这种对于身体的背叛,与后来周允在婚恋与情欲中的口是心非是同构的。这种“背叛”当然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她对于无能父亲的丧气,对于母亲的依赖与同情,对于自身卑微的命运与社会体制顽强抗衡时的退缩与茫然……但更重要的是,她似乎在告诉读者,“上海”这座城市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秩序,这种秩序不是法令,却是足以吞噬人、吞噬女性的,这种秩序甚至不只是金钱的,而且是阶层的,又或者金钱的就是阶层的,在对这些问题做更为具体的定义时,少女周允却又是十分迷惑的、说不清楚的。

评论家张定浩曾经评价钱佳楠的小说写出了上海人生活的贫穷,又或者是困窘。这种贫穷或困窘,相信许多人都曾亲历,却又因为不算是美好的记忆,被新生活所遮盖了。《不吃鸡蛋的人》所素描得最为成功的社会场景,反而是周允所从事教学工作的中学。周允牺牲自己的爱与恨,努力实现的阶层攀越,在那些她所授课的孩子们中是那么微不足道。她举家受尽多年委屈,培养她成为名校高材生的十多年经历,不过是给那些早晚会出国、会去常青藤求学的心不在焉的孩子们当教练。“这个社会人人都盼着有钱,人人都盼着成功”。周允可以面对家族成员的冷嘲热讽,遇上负心汉、难以与初恋相守终身,周允和其他普通女孩子一样伤怀、惋惜但总也可

以承受,她真正无法面对和没有经验面对的只有那个社会阶层最严酷的横截面,她在那里不快乐,她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钱和婚姻都无法解决的不快乐。“她受够了学校,可她自己也是个老师”,“没什么意思,她想说。可学校里没有能听懂她话的人”,“她想不明白,这些年令她迷惘的事情太多……她只能想是为了钱。”这个社会场景是新兴的,具有象征性的,是非常残酷的对峙与观看,周允在此空间中的抑郁与惘然,恰是我心中塑造得最好的切片。

小说最动人的莫过于周允与初恋情人重逢的段落。周允的初恋是地铁司机,是一个周允家庭怎么也不会接受的婚姻对象。周允不与他挑战世俗生活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保护,因为她知道她爱的人将会面对怎样的冷嘲热讽,而这些是她绝不愿意接受的。那个周允所深爱的男人对她说过的好听话,也不过是“你为何不干脆辞了工作?你在学校那种地方能待下去吗?”周允顿时就觉得“即便过了十年,他毕竟还是懂她的。”但她转而又说,“为了小孩,为了将来我的小孩能上这所学校。”周允并没有放弃令自己的后代能够通过“福利”的方式和那些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幻觉。这种模模糊糊的感知,反而是小说最令人感受到寒意的部分。

周允在苦楚地服从所谓“秩序”的同时,又何尝没有无意识地建设顽固的



《不吃鸡蛋的人》 钱佳楠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新秩序,例如对于已经消失的“闸北区”的偏见,又或者对于恋爱对象的“出身”标签……不喜欢的东西,实在也可以选择看不见。不想和“条件好”的人结婚,周允也可以不结婚。没有人爱自己,那就对自己多爱一点。今天说过不吃鸡蛋,明天完全可以在众人眼下吃一个,那又如何呢。别人的偏见,不只是在贫穷的人之间存在着,也会尖锐地存在于任何人之间。

小说中多次提到所谓给人生上“保险”,名校是保险,婚姻是保险,出身是保险……但人生哪有什么真正的保险可言。打捞内心深处的喜悦,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保险。我很喜欢周允从喜欢的人眼睛里看到的阳光,那是漫漫黑夜过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他开着地铁,一点一点看见了,她也看见他的看见,喜悦他的喜悦。

爱不正是这样美好又动人的事吗?